

社会存在理论视域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刘忠群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变量。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论为理论框架, 分析人口因素的核心要义可以发现, 其对社会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 且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大、进程快、区域与城乡分化明显等特征, 对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等构成严峻挑战。究其缘由,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 直接原因是生育率下降, 本质是“两种生产”理论, 即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失衡。应对挑战, 需从根基性、战略性、保障性与引领性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主动调整、优化社会存在结构, 重建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平衡,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之路。

关键词

社会存在理论, 人口因素, 人口老龄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 投资于人

Research on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istence Theory

Zhongqun Liu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variable affect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Using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existence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alyzing the core essence of population factors reveals that it both accelerates and slows down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also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Currently,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elderly population, rapid progress,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isparities,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labor supply and social security. At its root, the fundamental cause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the direct cause is the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and the essence lies in the theory of “two types of production”—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reproduc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coordinate efforts from four dimensions: fundamental, strategic, protective, and guiding, proactively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existence, rebuilding the dynamic balanc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forging a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Keywords

Social Existence Theory, Population Factors, Population Ag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vestment in Peop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上通常用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老年人口比重越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高。一般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老年型人口)的标准。中度老龄化是指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¹。截至2025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41‰,总人口负增长态势持续深化。从年龄结构看,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两项指标均远超中度老龄化标准,且低龄老年人口(60~64岁)占比达30.8% [1],随着这一态势的加速演进,预计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而迈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这种“未富先老”与总量巨大并存的人口老龄化特征,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消费结构与代际关系等构成系统性挑战。因此,深刻理解老龄化的成因与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科学、系统的应对路径,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重大课题。

现有研究多侧重人口学层面的趋势描述与经济学视角的冲击评估,或将老龄化简单归因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未能充分穿透现象表层。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论为解析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优势。社会存在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三大要素([3], p. 125),其中,人口因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构成,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它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其性质与方向深受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制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老龄化问题置于社会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调整与制度演进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才能穿透表象,把握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层逻辑。

¹https://www.stats.gov.cn/zs/tjws/tjbz/202301/t20230101_1903949.html

2. 人口因素在社会存在理论中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论科学解答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人口因素作为社会存在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其地位、作用与边界可从三重维度精准把握。

(一) 人口因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构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唯物史观的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 p. 519)这里强调的“有生命的个人”，即人口的物质性、实体性存在，是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绝对前提。人口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集合，更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唯一的、能动的承担者。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协作生产、文化创造和政治活动都将无从谈起。因此，人口因素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方式一道，共同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三大物质基石。它内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之中，作为“活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是社会存在中最具活力、最能动的物质性要素，是社会有机体的“血肉”与“灵魂”。

(二) 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

社会存在理论在肯定人口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对其作用的性质与边界有着清醒而辩证的认识。经典作家明确指出，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其“数量、质量和结构等因素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3], p. 126)。这一论断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启示：其一，人口因素的作用是“条件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它不能单独决定社会的性质、形态及其更替方向。一个社会是繁荣还是衰退，根本上取决于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非单纯的人口多寡。其二，人口因素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双向性”。当人口的数量规模、素质结构、空间分布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时，它能提供充沛的劳动力、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活跃的创新主体，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丰富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与工业化进程的结合，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腾飞，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反之，如果人口过度膨胀导致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就业压力巨大，或者人口结构严重老化致使劳动力短缺、社会抚养负担沉重、创新活力衰减，那么人口因素就会转变为社会发展的“制动器”，延缓甚至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正是后一种效应的现实预演与集中体现。其三，在现代社会，人口“质量”维度的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早已洞察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兴起，对劳动者的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在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健康水平和创新能力，远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必须将提升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置于战略核心。

(三) 人口因素受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制约

人口因素之所以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根源在于其本身的性质、状况和变动规律，深受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与塑造。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抽象、永恒的人口规律时深刻指出，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一般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5], p. 72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的规律会不断地创造出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种“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产物，而非自然意义上的绝对过剩。这一原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型，不能简单地用“人口转变理论”这一普遍模型加以完全解释，而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激烈的职场竞争，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及其带来的生育机会成本上升，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

的转型等,所有这些影响生育决策和人口流动的关键变量,无不深深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之中。因此,老龄化问题,表面上是人口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人口领域的投射与结果。

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表现与挑战

基于社会存在论对人口因素作用的理解,观察我国当前人口态势,老龄化无疑是最为突出的结构性变化。其表现深刻,挑战严峻,已构成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变量。

(一)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表现

1)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正向重度阶段过渡。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0%,65岁及以上占比15.9%,远超中度老龄化20%与14%的标准,且低龄老年人口(60~64岁)规模达997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30.8%,这部分群体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参与意愿强烈,仍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随着这一进程的加速,预测显示,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4亿人,占比超过30%,届时我国将迈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与发达国家漫长的老龄化历程相比,我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中度、重度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40岁提高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少用一半时间;总和生育率从5左右下降到更替水平,所用时间不及英法等国的三分之一[6]。这种“压缩式”老龄化,给社会适应和制度调整带来了巨大压力。

2) 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人口负增长常态化。少子化是老龄化的对应面和重要成因。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并在2023年降至约1.0的世界最低水平之一[6]。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仅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以下,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首次经历人口负增长贯穿整个五年规划期,预计总人口将回落到14亿以下。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底端收缩、顶端膨胀”的纺锤形或倒金字塔形,社会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据预测,2032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从2023年的22.5%提高到31.1% [6]。

3) 区域与城乡老龄化分异明显。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 [1],在此背景下,老龄化进程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不平衡。一方面,人口流动加剧了这种分化,年轻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使得部分中西部省份和农村地区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压力。研究指出,我国正面临“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老龄化城乡倒置挑战[2]。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政策执行历史、文化习俗等的差异,也造就了老龄化程度的省际差异,东北地区、部分中部地区等形势尤为严峻[2]。

4) 高龄化与不健康问题突出。老龄化自然演进的规律是,低龄老年人比重先提高,随后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加快提高。尽管当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岁以上,但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仍较短,这意味着老年人将长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这种长寿但不健康的问题,不仅加剧了个人及家庭的照护负担,也对国家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与保险制度提出了急迫挑战。

(二)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挑战

从社会存在论角度看,人口因素的结构性巨变,必然通过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互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带来以下挑战:

1) 对劳动力供给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挑战。2025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5,136万人[1],总量依然丰富,但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规模收缩,传统依靠人口数量红利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尽管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等加以部分弥补,但劳动力结

构的老化可能影响创新活力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给经济潜在增长率带来下行压力。

2) 对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挑战。老年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和抚养比的攀升，使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虽然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但制度成熟仍需时日。同时，养老服务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均存在缺口。目前机构养老床位虽已达数百万张，但护理型床位占比不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普惠化水平有待提升，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存在明显短板。老年医疗保健资源也需进一步向预防和康复两端延伸，以应对“长寿不健康”的问题。

3) 对消费结构与内需潜力释放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可能改变社会总消费的规模与结构。一方面，老年人口医疗、照护、服务等需求旺盛，催生“银发经济”；另一方面，老年群体通常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储蓄意愿较强，可能抑制整体消费扩张。研究指出，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但中老年人受社会保障水平、收入预期等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激发[6]。如何将老龄化催生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对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至关重要。

4) 对社会代际关系和文化价值观重塑的挑战。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模式。“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养老责任更多地从家庭转向社会。同时，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及其需求的变化，也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影响，推动社会观念从单纯的“敬老天经地义”向更加平等的代际关系、更加积极的老年观转变。这一过程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致代际隔阂与冲突。

4.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本质

要深刻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穿透表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本质。我国人口老龄化格局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口自身转变规律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共同作用的客观结果，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一)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决定社会性质、结构与变迁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指出，人口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现象。“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历史的基础”([7], p. 9)。我国老龄化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这直接推动了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显著降低，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岁左右跃升至如今的 79 岁以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民健康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人口效应。

第二，直接原因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也是老龄化最直接的动力。我国生育率下降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普遍性因素，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上升、养育成本上升、生育观念转变，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了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然而，政策的长期惯性叠加经济社会因素，导致生育水平在短期内快速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走低，提前并加剧了老龄化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单纯的“政策结果”，而是多种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学研究表明，我国转型时期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被迫延长等，都从客观上提高了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强化了低生育率的自我维持机制。

第三，重要推力是人口结构的队列效应。我国老龄化在短期内呈现加速态势，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出生高峰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出生高峰，尤其是 1962~1975 年和 1981~1997 年两个出生高峰期。当这些庞大的人口队列相继进入老年阶段，便形成了短期内老年人口激增的“队列

效应”，这就解释了为何“十五五”时期将成为我国老年人口新增规模最大的五年。

第四，制度与文化因素也加剧了老龄化应对的复杂性。我国老龄化进程发生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同时，快速的社会转型瓦解了部分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在完善中。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养老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突出。此外，重积累轻消费、重代际投入轻当下享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意愿和老年消费市场。

(二) 人口老龄化的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论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乃是“两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内部矛盾，在当代中国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具体体现与集中爆发。

“两种生产”理论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提出的观点，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8], p. 15)在这里，“两种生产”理论将社会存在的基础清晰地解析为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再生产过程：一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它为社会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它为社会延续提供生命载体和劳动主体。这两种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和动态平衡，社会才能顺畅运行。

然而，我国当前的老龄化态势，正是“两种生产”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发生阶段性、结构性失衡的鲜明写照：一方面，“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延长。这为人口老龄化(即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寿命延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物学前提。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侧面印证。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再生产，其模式和节奏发生了深刻转变。在土地财政、户籍壁垒、高强度劳动等机制共同作用下，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年轻人口的增长速度远慢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金字塔的基础持续收窄。于是，“两种生产”之间原有的、与高生育率相匹配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了。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能力和成果(表现为财富积累和寿命延长)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表现为低生育率)之间，出现了显著的、阶段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外在地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内在地则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矛盾：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矛盾、养老保障资金收支的矛盾、家庭照料能力与社会服务需求的矛盾、传统养老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矛盾等。

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其根本目标不在于(也不可能)逆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而在于主动地、系统地调整和优化我们的社会存在结构——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体系和价值文化导向——使之能够适应并妥善处理因“两种生产”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

5.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路径

基于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理论指引和对老龄化本质的深刻把握，我国的应对之策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原则，从优化社会存在整体结构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与实践创新。

(一) 根基性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物质生产方式的适应性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力量，应对老龄化首先需从生产端发力。一是加速创新驱动转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使未来劳动力数量减少，也可凭借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素质提升保持社会总产出，从根本上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压力，正如马克思所

指出的“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9], p. 85), 新质生产力正是对这一自然力的高效转化。二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将老龄化需求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², 制定专项规划引导老年用品、健康管理、智慧养老等产业发展, 2023 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达 7.8 万亿元, 预计 2035 年将达 30 万亿元, 既能满足老年群体需求, 又能培育新增长点[2]。

(二) 战略性路径: 全面实施“投资于人”, 推动人口红利转型升级

应对老龄化的核心在于“人”本身。必须将“投资于人”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高度, 实现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向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和“人才红利”的历史性跨越。一是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体系。通过经济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产假育儿假制度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推动教育公平与减负等多种措施, 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尽力扭转生育率过低趋势。二是全方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应对当下和未来挑战的关键。持续增加教育投入, 深化教育改革, 着力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重点加强对大龄劳动者、转岗人员的技能培训, 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和预期健康寿命。通过提升人口整体素质, 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创造更大价值, 有效对冲数量减少的影响。三是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树立“老年人是宝贵社会财富”的理念。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企事业单位聘用退休专家和技术人员、发展老年志愿者服务、支持老年人创业、兴办老年大学等多种形式, 为有愿望、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这不仅部分补充劳动力, 更能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 变“负担”为“资源”。

(三) 保障性路径: 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 构建可持续的支持体系

社会存在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必须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一是健全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 扎实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巩固“第一支柱”; 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壮大“第二支柱”; 规范发展个人养老金, 推动“第三支柱”建设。在医疗保险方面, 深化支付方式改革, 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并尽快全面推开, 破解失能老人照护的资金难题。所有改革都需着眼长远, 确保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二是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通过适老化改造补贴、家庭照护者支持政策(如“喘息服务”、护理技能培训)等予以支持。强化社区养老的枢纽功能, 加快建设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等设施, 打造“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提升机构养老的专业化水平, 重点发展护理型床位, 满足失能失智老人的刚需。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在资源布局、服务衔接、人才培养、支付机制等方面的融合。三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乡村振兴中全面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公共交通、公共场所、数字智能设备的适老化改造。加强老年宜居环境的标准制定与执法监督。发展智慧养老, 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服务可及性、便捷性和管理水平。

(四) 引领性路径: 培育积极老龄观, 营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文化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必须加强宣传引导, 构建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舆论和文化环境。一是大力倡导“积极老龄观”。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渠道, 广泛传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展示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生动案例, 消除对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二是加强代际沟通与融合。鼓励开展代际共融活动, 如“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祖孙同乐项目等, 增进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将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与新时代

²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26/202401/content_6928803.html

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推动形成家庭孝老、社会敬老、全民爱老的良好风尚。三是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相关课程中增加人口国情和生命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对老龄化社会的科学认知和积极态度。

6.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绝非单纯的人口学现象,而是社会存在内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结构性失衡的集中体现。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这两种生产必须保持动态平衡。我国当前的老龄化态势,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飞跃、医疗卫生进步、寿命延长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则是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客观结果。这一失衡并非不可调和,其本质指向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制度安排与文化观念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适应性滞后。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不在于试图逆转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客观趋势,而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主动调整和优化社会存在的整体结构。这要求我们从根基性、战略性、保障性与引领性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根基层面,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型;在战略层面,应将“投资于人”提升为国家战略,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体系与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推动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历史性跨越;在保障层面,需深化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及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改革,构建可持续、多层次、全覆盖的制度支撑体系;在引领层面,则要培育积极老龄观,推动代际融合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为应对老龄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共识。

参考文献

- [1] 王萍萍. 2025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0489万人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N]. 中国信息报, 2026-01-21(002).
- [2] 刘维林, 杨勇, 李志宏, 等.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24, 26(6): 19-31.
-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23年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蔡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 趋势、机遇与应对[J]. 国家治理研究, 2025(4): 9-16.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